

# 現當代文學研究概述

林肇豐

## 一、前言

相較於前幾年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可見到「跨域與跨界」、「華語語系文學」、「太陽花學運的反思與檢討」等主要趨勢，2017年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則大致無明顯趨向。

規模較小的集中闡發還是有的：《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5期（10月）推出「台灣文學裡的感官與情色」專題，加上前期戴華萱、曾秀萍兩篇論文，以及紀大偉出版的專書《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台北：聯經）。同志、情欲和感官等議題在本年度研究上，有稍微突出的現象。

華語語系研究方面，史書美的中文專書《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出版；6月份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所、人文社科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合辦「華語語系·台灣：華語語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而《中國現代文學》32期（12月）的「台灣與華語語系研究」專題，則刊出該研討會的幾篇論文。乍看之下，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的浪潮似乎達致近年來的頂峰，但仔細觀察便能發現，（會議）後續倒未激起多方漣漪。或許可以這麼解讀，史書美（和王德威）早期開山立宗、搭建骨架的基礎工程已經完成，接下來該是進入填補血肉——針對世界各地的華語語系文學進行細緻的研究、分析或比較——的階段了。

此外，本年度關於現代詩的研究篇章

也較往年多些，其中《文史台灣學報》11期（12月）推出「台灣新詩史論」專題，有別於純粹的詩人詩作分析，更著重在「新詩史」的討論，也可謂是比較特別的集中展現。

除了上述幾項之外，嚴格來說，還有更多的研究專書和論文並未構成集體傾向，而是學者們分別就專門領域持續深耕，有各自精采的展現。以下無可免俗地，先針對2017年度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幾項小趨勢進行探究，爾後再對於「其他重要篇章」一一闡述。

## 二、同志、情欲與感官

紀大偉的《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出版，無論對台灣文學研究或台灣的文學史書寫而言，都是一重大里程碑。他在書題上便已指出，「同志文學史」是一種台灣的發明，甚至就「同志現代性」所立足的物質基礎——現代中文報紙而言，它更是一種「期間限定」的台灣發明，今日欲探究台灣同志的生活或精神樣貌，已不會再由文學（史）入手了。全書扣除「緒論」和「後記」共分6章，大致對應台灣戰後的六個十年，同時也回應冷戰前後的三個分期。作者在各章標題表明特別關注的議題，亦即每一年代之「突破」，例如在1970年代的女女關係上，標出「愛錢來作伙」，即是將焦點擺置在經濟力與女女組合的互動；而1980年代的「罷家做人」，則特別關注當時文本頻繁描寫的「同

性戀者離家出走」現象（頁93）。一般而言，1960年代成名的作家白先勇，經常被視為台灣同志文學的起點，而作者則在「追認冷戰之前的資產」之餘，提出1950年代乃是同志文學史的關鍵十年，他挖掘當時報上提供的大量同性戀相關訊息，視之為形同「培訓」了國內讀者以「現代中文」去認識同志，並指出若缺乏這些向社會播下的種子，1960年代描寫同性戀的作者便沒有現成讀者可以收割。這些視野皆有別於以往的文學史論述。

除了研究專書，曾秀萍在〈灣生·怪胎·國族——《惑鄉之人》的男男情欲與台日情結〉（《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4期，4月）一文中，則討論了郭強生的長篇作品《惑鄉之人》。她指出以往台灣的同志文學都與國族、歷史等「大敘事」保持距離，而《惑鄉之人》則透過幾段日治以至戰後的日、台男同志關係，將情欲、階級、種族與國族等議題進行繁複交織的辯證，例如小說主角松尾森戰後的重返台灣，既是「灣生回家」的故事，也是「酷兒離散」（queer diaspora）的故事；同時他已不再弱勢，更是挾帶著前殖民者的榮光與文化、經濟資本重臨前殖民地。此外，曾秀萍也指出《惑鄉之人》固然開拓了多元並存的異質空間，但是以男同志自戀欲望為中心所主導的台灣寓言，卻也有將非主流女性與陰性化特質再度邊緣化、污名化的危險。由此可知，縱使是同志社群或同志文學作品，仍存在「性別政治」的課題。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5期（10月）推出「台灣文學裡的感官與情色」專題，收錄有3篇論文；嚴格來說，各篇章的精彩內容與專題要旨之間，其實存有一定距離。陳培豐〈重新省思日治時期台語流行歌曲——以民謠觀的建

立和音樂近代化作為觀點〉一文，以民謠觀的確立和音樂近代化之整備為取徑，對台灣、日本甚至朝鮮的流行歌曲發展進行比較。他指出台灣的流行歌曲工業雖幾乎與日本、朝鮮同步發軔，但當時台灣的民謠觀及民族主義尚未建構成型，故帶有「歌仔調」的流行歌曲遭到知識分子貶抑、排斥。同時，支撐流行歌曲工業的近代化軟硬體設施，也尚未在戰前台灣落實生根，因此縱使台語流行歌曲工業在帝國架構下尚能以殖民地之姿做得有聲有色；一旦脫離殖民母國，其戰後的發展便顯得捉襟見肘。

侯如綺在〈禁錮與救贖——舒暢《那年在特約茶室》與梅濟民《火燒島風情系列》探析〉中，則比較了舒暢和梅濟民的兩部作品，指出它們同樣發表於1990年代初期，同樣都由外省作家的自身經驗出發，並同樣都描寫了相對於台灣本島的兩座離島；論文後半部更透過「水」所連串的相關意象：水、船、貝殼、海濱小屋等，探討作家對於自由、慾望、知識與生命的渴望。但是，「火燒島—政治犯—監獄」與「戰地—軍人—特約茶室」兩者對於「肉體的禁錮與操控」，其形式、程度是否真能如此相提並論？頗值得存疑。

鄧筠的〈煩擾的肉身——楊德昌電影裡的少女形象〉，則透過「身體」理論的視野，分析楊德昌電影中諸多少女角色，指出她們的形象仍不脫文藝作品慣有的二分法——妓女或母親。有別於不少前行研究強調楊德昌作品宣揚女性獨立自主之傾向，本論文則認為楊的電影在充溢對女性的理解和同情之下，亦潛藏著嫌惡女性的氣息，這不應完全歸咎於導演一人，而更應該理解為整體社會文化或時代精神的體現。

相較起來，戴華萱發表於24期的〈如何

測量情色的深度——李喬與鍾肇政、葉石濤的情色論對話〉，或許更符合「台灣文學裡的感官與情色」此一主題。在論文中，她指出李喬於80高齡出版《情世界——回到未來》，完成了對鍾肇政《歌德激情書》和葉石濤《蝴蝶巷春夢》誤讀的致歉心願。而這三部被視為書寫情／性欲的作品（或三位作家的「情色論」），其實都有各自更深層的關懷主題，例如李喬和鍾肇政同樣主張「性情愛合一」，但筆下人物的「際運」有所不同；而葉石濤則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對於漢人綱常傳統有所對抗。作者並指出，李喬在這部號稱最後一本長篇的小說中使用後設手法，卻不認同後現代社會去中心、人機界限泯除的現象，仍希望透過創作反映、再現社會，並謀求匡正改進。

### 三、華語語系（文學）研究

由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所、人文社科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合辦的「華語語系·台灣：華語語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於6月24-25日登場，其面向「台灣」、規模盛大，而且該領域的奠基者史書美、王德威皆出席並進行對談，可見華語語系（文學）研究近年來在台灣推動與開枝散葉的情況。

史、王兩人的對談不乏火花。史書美奠基於其專書的「反離散」立場，重申「離散有其終時」，釐清「離散作為歷史」和「離散作為價值」的分別，並強調現世性與理論的「倫理」課題；而王德威則認為離散的歷史與價值之分野，二者難以清楚切割。他甚至指出離散有時可以作為積極的價值，具有政治批判性；相反地，反離散有時則淪為充滿獨斷和霸權的價值。基本上這是

華語語系研究在取徑上的「經典」論爭，此一對談亦收入《中國現代文學》32期。

在《中國現代文學》32期（12月）中，還收有4篇改寫自上述會議的論文。高鈺昌的〈以聲發聲的華語語系：王禎和文本中的台北聲音景觀〉，以王禎和的〈小林來台北〉和《美人圖》為分析對象，指出其中建構了1970年代前後台北辦公室內部獨特的聲音景觀，並以此為例嘗試說明，若以「聲音」而非語音做為討論台灣文學與華語語系之基礎框架，或許我們得以聽見更多可能；而陳國偉的〈無聲無襲？——華語語系、民族國家與聲音的視覺化〉，則分析平路的《何日君再來》與中國作家麥家的《風聲》及其電影版，指出民族國家對於聲音（尤其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競逐後的聲音視覺化過程）之收編／襲擊是無所不在的，這對於華語語系透過聲音多元所應許的在地主體建立，必然形成極大挑戰。而《風聲》影像中無法完全壓抑的性慾差異取向，則在民族主義的愛國呼告中找到逃逸路徑。陳筱筠的〈複數的「我們」——《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中的主體對話與歷史過程〉，則以顧玉玲書寫在台菲律賓移工的《我們》為分析對象，指出這部以在地主流語言（華語）寫作的報導散文，嘗試將外籍移工在台灣的移動與勞動、台灣底層勞動階級，以及中國來台並因經濟因素不斷遷徙的新移民皆納入「我們」的敘事中，可謂提供華語語系研究一個獨特的視角與案例。

這三篇論文都表示更能開拓華語語系研究或架構之可能，但比較令人困惑的是，如同其中某文的段落標題所詰問：「透過由台灣生產的華語語系文學，我們可以看見什麼？」事實上若將「華語語系」四字拿

掉，透過觀察「由台灣生產的文學」，上述各篇章的內容論點不也依舊完滿自足？

陳芷凡的〈想像共同體的（未）完成——金門籍南洋作家的華語語系表述與反思〉一文，則透過相對於台灣大島的「離島」金門之僑鄉文學，對於「華語語系」提出了有效的辯證。她指出台灣有關南洋地區的作品討論，多聚焦於（在台）馬華文學，而她則以金門籍南洋作家寒川、黃東平為例，梳理金門縣政府和民間文史工作者如何以僑鄉文學的角度去建構——或者說擴大「金門學」。而比起寒川的案例，黃東平的作品並非描繪金門華僑落番的故事，也並未重整自身與金門「原鄉」的連結，這其實呈現了「金門」作為一想像共同體的不同意見。華語語系研究在「反離散」的立場上，反對那種先天認定所有海外「中國人」都想落葉歸根、重返原鄉的「離散中國人」概念，但這類「返本」的欲力似乎在台灣／金門亦可見到？故陳芷凡指出這依然涉及了永恆的叩問：文學為誰而寫？文學要用什麼語言進行書寫？

此外，詹閔旭發表於《台灣文學學報》30期（6月）的〈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以馬華文學的台灣境遇為例〉，則以2015年「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的票選活動為引子，提出當前學界或文壇傾向以單一地方作為批評判斷的標準，越來越難以回應許多作品實為多地文化共構的產物。爾後他對於鍾怡雯的散文〈垂釣睡眠〉、辛金順的詩〈注音〉、黎紫書的小說〈山瘟〉三者在台灣文學獎場域之際遇，進行策略性的分析，進一步倡言所謂「多地共構」的書寫和閱讀，其實便是企圖藉由「關係性」的思考，去挑戰或開拓華語語系研究當前既成的「中

國文學vs.單一在地華語語系文學」認知架構。

#### 四、現代詩（史）

本年度關於現代詩的研究論文、專書不少。《文史台灣學報》11期（12月）推出「台灣新詩史論」專題，雖然篇章彼此未有整合，但在各自發揮下仍提供不少新創觀點，補充台灣新詩史與文學史的些許空白。

劉怡臻的〈王白淵與日本大正詩壇的交會——論《荊棘之道》詩作對於野口米次郎文學的接受〉，比對王白淵的《荊棘之道》及日本大正時期著名詩人野口米次郎的作品，發現兩者無論在字句、詩作主題或比喻組合上，皆有高度相似，由此可見王白淵確實深受野口作品的影響，同時亦受1920年代盛行日本的象徵主義影響。此反映到台灣現代詩史研究的意義為：對於《荊棘之道》的解讀實有更多可能，未必始終要以王氏日後參與左翼運動，來反推這部詩文集具備左翼關懷。

蔡明諺的〈山的那邊：論「橋」副刊的新詩〉一文，撇開了過往研究經常鎖定的《台灣新生報》「橋」副刊論戰，重新彙整原始資料，仔細爬梳「橋」副刊的內容意義。他指出副刊上本省、外省知識分子的表現差異有：在「小說」譯介上，無論省籍多接受俄國影響；在新詩譯介上，本省作家的介紹較多元深入。在新詩創作上，外省作家的主要風格偏向象徵主義式的個人抒情，本省詩人的創作則已可見現代主義詩學發展之基礎。在新詩評論上，本省作家大放異彩。此外，本論文還具體說明了歌雷（史習枚）來台前的文學歷程，以及「橋」副刊結束後持續活動於台灣報界的情形，以補文學史論述之空白。

陳澄州的〈1950年代台港兩種「現代」的

開端：以《現代詩》與《文藝新潮》為觀察對象，則將視野放諸台、港比較上，透過比較台灣的《現代詩》和香港的《文藝新潮》兩刊物，並以史班德〈現代主義派運動的消沉〉中的兩種原動力進行評價，可發現兩地在接引西方現代主義之初即有很大不同：香港《文藝新潮》希冀將之轉化為直視香港社會的利器，而台灣「現代派」不僅迴避政治走向純文學，更配合文藝政策而自我閹割。

解昆樺的〈意象中國：1970年代戰後第一世代詩人的國族符號建構〉，則檢視戰後第一世代詩人在1970年代如何運用中國意象符號成就詩作與國族，包括分析整體抒情的中國古典特質，並進一步比較神州詩社、余光中和台灣本島詩人之間的細緻差異。本島詩人由於擁有不同的經驗過往，使得他們在意象中國的建構中投射鄉土中國（台灣）符碼，擴編其詩文本的世界觀及國族書寫系統。

以上4篇就時段、地域或報刊等面向，對於台灣的現代詩史有所補白；而其他篇章則走比較傳統的詩家論路線，亦有相當貢獻。楊宗翰的〈楊牧、楊澤與羅智成詩中的現代抒情風貌〉，延續過往多篇文章之「異見」，將台灣新詩史分為7期，其中「回歸期」（1972-1983）之特徵為正視現實、肯定明朗、關懷鄉土、擁抱民族；不過當時方二、三十的楊牧、楊澤與羅智成三人詩作，卻輕易躍過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路線的傾軋鬥爭，展現現代的抒情性，亦富抒情的現代感，一新彼時台灣現代詩的風貌。

林中力的〈「反諷」詩學的探討——兼以陳黎的詩作為例〉，先由「反諷」的歷史脈絡入手，接著考察陳黎的詩作，從形式、社會與美學三大面向觀察其「反諷」的構成與內涵，

目的在開發「反諷」詩學（研究）更多的可能性。王文仁的〈生命追尋與島嶼凝視：羅葉詩創作歷程及文本分析〉，則分析羅葉四部詩集，指出其主要趨向有：聚焦生命存在意義的思考、對藝術創造的闡述與自剖、對社會政治課題的捕捉與揭破、情愛與疾病課題的書寫。

除了《文史台灣學報》外，在《中外文學》46卷1期（3月）還有張松建的〈詩史之際——楊牧的「歷史意識」與「歷史詩學」〉一文，考察楊牧自1968至2011年所寫下的22首「歷史題材」現代詩，指出其歷史詩學乃投射抒情自我於當下處境。若一言以蔽之，即從個人感懷出發、抵達公共領域，見證了後殖民全球化背景下，本土意識的蓬勃與文化認同的轉向。此外，林中力在《中外文學》46卷2期（6月）還發表有〈冷戰意識形態與現代主義的文化想像——以戰後台灣與中國的現代詩論述為觀察中心〉一文，從「為何是現代主義在冷戰期間異軍突起？」的問題意識出發，對台灣1950年代中後期與中國1970年代末期，兩個現代主義的「重返」狀況進行考察、比較。作者指出現代主義之所以受到美國陣營歡迎，一方面是其長期以來與共產主義處於對立面；二方面是其專注於個人和自我探索的特質，符合冷戰下的西方意識形態。而在中國，雖然時代背景不同，但現代主義在文革期間亦被視作禁錮的破口、找回個人自由與獨立的手段，在文革後更是被施以「現代化」的形象而重返文藝領域。如就對現代主義的評價而言，林中力的這篇論文，實可與前述陳澄州的論文產生對話或相互闡發。

在研究專書方面，本年度有陳義芝的《風格的誕生：現代詩人專題論稿》（台北：允晨）。全書基本上為詩家論，但透過

「風格」批評而具有統合性視野。至於何謂「風格」？作者係指構成詩人精神個體性的內涵與形式，是詩人以文字表達自己的獨特樣貌；他更指出本書所論風格非指時代、流派、地域風格，而指個人風格——兼論作品主題內涵及語言藝術。以「風格」作為批評基礎，本書共考察了覃子豪、周夢蝶、余光中、痲弦、楊牧、張錯、席慕蓉、夏宇八家詩人，以及「學院詩人」一類型。

而陳政彥的《身體·意識·敘事——現代詩九家論》（台北：秀威），則由「身體」、「意識」、「敘事」三方面切入，縱論鯨向海、凌性傑、陳克華、蕭蕭、鄭愁予、席慕蓉、嚴忠政、賴和、余怒九家詩人。

## 五、其他重要研究

除了上述幾項小趨勢之外，本年度現當代文學研究更多的，還是學者們就各自關注領域所長期耕耘的成果。專書方面，今年日治時期文學研究出版有幾部著作，如邱雅芳的《帝國浮夢：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南方想像》（台北：聯經），系統性討論1910年代前後以至1940年代的日人作家作品，尤其聚焦在小說與紀行文體的「南方」想像上。所謂「南方」，在全書中基本上等同「台灣」，而不同歷史階段的書寫，呈現了不同的南方／台灣論述。作者表示1905至1920年的小說紀行文類是文學史上的空白，故本書由竹越與三郎和中村古峽出發，便是欲彌補此一缺口；爾後討論1920年代的佐藤春夫；1930年代的中村地平、真杉靜枝；1940年代的西川滿與《文藝台灣》，指出各式文本構建出一條再現南方／台灣的系譜，並分析其殖民地意象或南方思維以何種策略現身。作者於結論指出，日本的「南方」概念歷

經幾階段變化，由最初的模糊未明，到以台灣為主的南方想像，直至日本積極發展南進政策時，南方的概念隨之無限膨脹。很清楚地，本書主要重心擺置在第二階段，而南方／台灣的南方，則為日後可持續追索深化的課題。

朱惠足的《帝國下的權力與親密：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種族關係》（台北：麥田），以日治時期台灣小說中的殖民地種族關係書寫為探討對象，分別將警民、通婚、抗爭、友情、混血等不同形態的種族關係再現加以歷史脈絡化，分析日本帝國如何透過「認同」與「差異」的政治操作建構民族差異和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以及不同歷史階段下的日本人作家及台灣人作家，如何將日本人、台灣漢人、台灣原住民等不同種族之間的接觸、互動與交混，「翻譯」為具有種族、性別與階級意涵的帝國與國族主體。事實上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既屬世界殖民歷史之一環，但相較於遠渡重洋至他處進行殖民統治的西方白人帝國而言，又有其相當的特殊性，對之加以考察，本身即兼具殖民研究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意涵。而作者在〈終章〉中也指出，從本書的討論可以發現，縱使日本帝國的論述建構了許多如文明、血緣、語言、情感、精神等邊界，但殖民地台灣種族關係的文學再現，卻揭露出這些邊界並非如官方論述所宣稱那樣堅固穩定，而是充滿了縫隙、歧義與流動性，以及「教學指導」與「實際操演」之間的不一致。而這些無法被消弭的不穩定或歧義想像，正正干擾著奠基於各種種族二元對立的日本帝國及其國族想像。

河原功著，張文薰、林蔚儒、鄒易儒翻譯的《被擺布的台灣文學：審查與抵抗的系譜》（台北：聯經），為2009年作品的中文版，內容共收錄14篇論文，結集1994至2008年的日治

時期台灣文學研究成果。河原功的研究向以細讀文獻、嚴謹考據著稱，全書共分三部分：在「台灣作家的抵抗」中，作者考察楊逵、吳新榮、吳濁流等人的抵抗精神，以及與官方言論統制的游擊搏鬥；在「日本作家的觀點」部分，爬梳佐藤春夫、中村古峽、濱田隼雄以至中村地平、真杉靜枝等日人作家觀看殖民地台灣的角度。其中在濱田隼雄的篇章，尚提及他在戰後與中國來台作家黃榮燦的相遇互動，且自承戰爭時期自身世界觀的「扭曲」，相當精彩；在第三部分「不為人知的審查制度」中，作者既從大環境也由個案著手，探討日治時期以及隨著戰局發展而愈加緊縮箝制的審查制度。尤其在1937年各大報廢止漢文欄的研究上，河原功（以及中島利郎）的研究細緻地指出總督府雖未明令全面禁止，但整體氛圍（包括來自軍方的壓力）已經形成的狀態。本書為河原功第二部台灣文學研究論文專著，填補了過往研究不少面向之空缺。

「兒童文學」在台灣文學研究中始終處於比較特別或邊緣的位置，吳玫瑛的《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台灣少年小說專論》（台南：成功大學），是近年來兒童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也為其地位「發聲」。本書探討戰後台灣少年小說，爬梳範圍自1960年代至新世紀初，內容共分5章，首章〈導論〉即以台灣與西方的比較視點，探討戰後台灣「少年小說」的論述、界域想像與流變。爾後，擇取「焦點文本」包括林鍾隆《阿輝的心》、謝冰瑩《小冬流浪記》；張大春《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袁哲生《倪亞達》系列；戰後遷台女作家的少年小說，以及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所培植的「戰後世代」女作家之得獎作品

等，自「好孩子」、「可愛的兒童像」、「鄉／土」、「日記體」等不同議題切入探析。

黃文倩的《不只是「風景」的視野：後革命時代兩岸現當代文學比較論》（台北：學生書局），採取近年來已少見的台灣與中國比較視野，可謂本年度現當代文學研究中較為特殊的「風景」。本書所謂「後革命」，之於中國指1978年改革開放後，之於台灣則指1987年解嚴後；同時作者也有意探問在「革命」理想退燒後，文學在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之世俗下還能如何深入、擴展？全書主論共分5章，分別由主題影響、思潮淵源、接受典律、主體比較和想像參照等比較視角切入，考察魯迅、陳映真、茹志鵬、王安憶、莫言、龍瑛宗、路遙、汪曾祺、陸文夫、陳若曦、張大春、駱以軍等作家作品，分析他們對於「國民性」的思考、社會主義思潮的淵源與聯繫，以及不同歷史階段下的主體發展與差異等。

在期刊論文方面，山口守的〈北京時期的張我軍：被文化與政治夾擊的主體性〉（《台灣文學研究集刊》20期，2月），針對張我軍長達20年的第二期北京生活（1926-1946）進行研究，是過往相對較少人關注的課題。此文主要由日本文學翻譯、參與電影《東洋和平之道》製作、擔任「北京大學」日語教授、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四點切入，探討張我軍的日語能力如何牽涉其「國民」的主體性生成，以及作為台灣出身者之主體性何在。作者指出張自視為現代中國人，但試圖以研究日語與日本文化之學者姿態去確保主體性，最終在時代洪流中被納入對日合作體制。在結論處，作者透過與周金波的對比，指出同為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台灣作家，大家對於張我軍和周金波在戰爭期間文學活

動的視角迥然不同——張我軍被指責身為中國人卻與日本合作，周金波則為一名殖民地人被劃入帝國的文化體制之內。事實上此處所謂「大家」，所指是同時代人，抑或日後意識形態各異的研究者們？其實「大家」看待張、周二人的方式，仍存在著諸多差異。

張誦聖發表於《台灣文學學報》31期（12月）的〈戰時台灣文壇：「世界文學體系」的一個案例研究〉，看似考察日治戰時台灣文壇，但背後有其特別的「大」關懷。作者指出在當前世界文學體系的討論中，東亞地區現代文學受重視的程度，仍無法與曾經直接受西方殖民統治地區所產生的作品相提並論，其關鍵在於我們缺乏了將東亞地區視為一整體，而去釐清區域性文學發展的共同特質、動力和演化模式的系統性綜合考察。因此本文在「見樹」與「見林」間選擇後者為切入視角，試圖將討論焦點由「產品」移向「過程」，由「孤立的個別事件」移向「共通的演化模式」，由「單一國家文學的特徵」移向「不同東亞社會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之間所展現的結構性類似」（頁7）。而對於「戰時台灣文壇」的考察實為一個案式的嘗試，從方方面面對於20世紀中期戰時的台灣文學榮景進行描述，並認為在權力結構具有親近性的東亞現代社會中，該些文學發展的基本模態或許具有共通性，而能在其他如日殖下的韓國、淪陷期的上海、戰後美軍佔領下的日本等案例中見到。

范銘如的〈小說中的線〉發表於《台灣文學學報》30期（6月），延續其長期對「文學中的空間」之探究，本論文關注小說中的線、路、徑、途。作者指出多數小說的重點情節發生於定點，而「路」往往只是輔助或次要性的空間；但總有一些精彩故事是發生

於路途上的，而本文即是探討這些「反客為主」以路途為主要空間的台灣小說，並梳理出四種類型，包括「行路難」——以路上實際可能遭遇到的狀況去做文學性的引申比喻；「人生路」——以路的中介隱喻，做一種人生處境的比喻；「沿路風景」——路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路旁的風景、事物、事件，路類似於輸送帶，而敘述者則像是導覽員；「文脈與迴路」——「線／路」是做為小說情節的後設比喻，與現實道路無涉，針對的是小說敘述主線、支線、單線或複線進行的藝術形式類比。最後作者也強調，這四種以路線做文章的台灣小說只是較為清晰可辨之類型，其他的可能形式尚有待研究開發。

林運鴻的〈忘卻「階級」的兩種左派——比較台灣文學史論述中的「後殖民左翼」與「族群導向的階級敘事」〉（《中外文學》46卷2期，6月），分析文學史著作與解嚴後台灣小說文本，指向了兩種忘卻「階級」的左派（敘事）。事實上「兩種」背後所連結的即是本土主義者與外省知識分子兩個統獨意識形態分歧的群體，其中前者的「左翼」後殖民史觀雖指向對現有體制的批判，但主要關懷乃是反省國家在族群與文化上行使的各種暴力；而後者的小說敘事穿戴著階級外衣，反駁到「無產外省人」毋寧才是台灣社會中最弱勢的，所指向的仍是族群問題。嚴格來說，林運鴻指出的當前（論述）狀況並不十分新鮮，但這篇論文確實是足夠「直白」的；而值得更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何比起階級議題或左翼理論，民族主義／族群／統獨議題始終能截獲較多台灣民眾或學者的目光？台灣社會及其歷史發展究竟除了甚麼問題？抑或有何「特色」？



## 六、結語

事實上本年度尚有許多精彩且重要的研究專書、篇章值得列舉，但在篇幅有限的情況下，無法一一討論。本文僅就其中足以代表幾項小趨勢的專題，以及對於前行研究或文學史論述之空白處較有補充的書目篇章，略舉數部、數篇，期能盡量勾勒出本年度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概略樣貌。

正如前言已提過，今年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裡雖然有著規模較小的集中闡發，但整體而言並無明顯的趨勢。如此新一階段的盤整情況，其實未必不是好事。專長各異的學者們不急忙去追逐熱門流行的議題、術語或理論，而是就各自領域投注心力長期深究，所獲致的成果縱使不見得華麗炫目，卻也都是渾厚有成。何況台灣文學研究隨著歲月的積累，如今也應該抵達「專業化」的程度了吧。而高度專業化的到來，無非就是「分眾」時代的來臨——你吃你的牛肉麵，我愛我的滷肉飯，各有所好，亦各取所需。